



武氏墓群石刻



骆承烈

朱锡禄



945
41

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
中国古代史研究室

一九七九年

说 明

本稿系本室骆承烈同志与嘉祥武氏祠管理所朱锡禄同志合作完成。1960年已写出部分初稿，1979年底于武氏祠定稿。限于水平，质量不高，请各方面专家、同志们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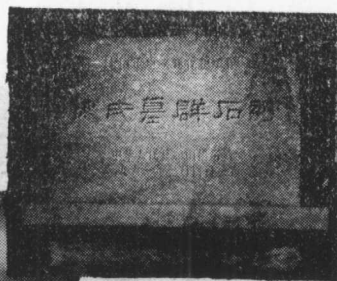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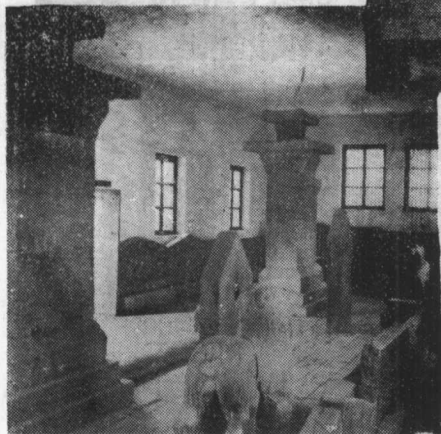
曲阜师院历史系

中国古代史研究室

1979年12月12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标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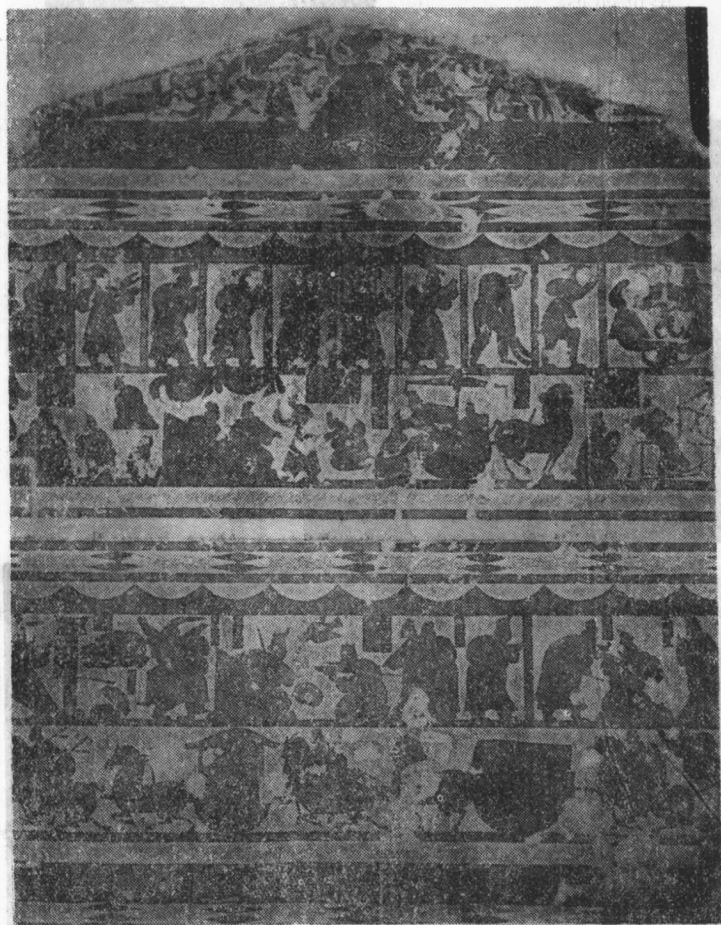
陈列室内景 ↓



(照片均黄业成摄)

陈列室外景 ↓





武梁石室第一石

目 录

第一章	概述·····	1
第二章	碑碣·····	12
第三章	石阙、石狮·····	27
第四章	画像石·····	37
第五章	画像内容略释·····	62
〔附〕	画像分类索引·····	110

第一章 概 述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劳动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精神文明，使我国长期以来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位于山东省嘉祥县城南武宅山西麓的武氏墓群石刻，就是我们的祖先多年来所创造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国劳动人民两千年来辛勤创造的文物瑰宝，也是世界上一批著名的古代艺术珍品。

艺术在我国起源很久，早在四、五万年前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就发现一些记载他们生活情景的绘画和各种装饰品。仰韶文化的彩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及各种玉、石、骨、角、牙雕、秦汉的瓦当、印章等，都各自具有其特殊的艺术风格，到了东汉时期，则出现了一种绘画和雕刻相结合新的造型艺术，这就是具有高度艺术水平且又能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画像石。

早在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巡行天下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威焰和镇压各地的反抗势力，曾到处勒石记功，遂开了历代树碑立碣之风。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死后，其后人往往在其墓前立石若干块，用以颂扬死者的功德。但西汉大多是石刻文字，而到了西汉晚期以后，则往往把图画也刻到石面上，这种著名的古代艺术品——汉画像石就在东汉盛行起来。

一、东汉的画像石

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生前享受、淫乐、骄嫖、专横，他们死后也还想要继续其骄奢淫逸的生活，再加上笃信天命、鬼神，所以大都很重视自己死后坟墓的修筑。在战国以前，坟墓比较简单，除天子、诸侯等最大的贵族外，死者多葬在露天的土坑内，即所谓竖穴。而到了汉代，则普遍以洞室为墓，即所谓横穴。这种洞室墓又分为单纯土洞墓、空心砖墓和砖室墓。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在统治阶级中则又盛行着一种石室墓。即由若干石块扣成墓室，在石上刻有各种图象，所以又称“画像石墓”。这种“石室通常立于坟丘之前。室平而作长方形，后面及两山俱有墙，正面开敞，正中立八角石柱一，分正面为两间。房顶厦两头造，即清代所谓悬山式。上施脊，瓦陇、瓦当均由石块上刻石”。①室内画像石的题材和做法，则一方面上承我国画像纹及狩猎纹的器物图案而加以发展，另一方面又由战国到汉许多宫殿中大幅故事壁画及一部分墓室内画像、空心砖之构图演变而来。

在墙上画像用以教育、训示后人的做法，在我国很早就有了。《左传》定公二年传：“晋灵公不君，厚敛以彫墙”。

“彫墙”可能是墙上的装饰画。因为当时出现不多，偶尔出现，故被当作“不君”的表现。阶级社会以来，统治阶级提倡壁画，自然为其统治服务。据古籍记载：“文王周观得失，偏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皆著于明堂”。西汉初，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也曾于未央宫承明殿内令人画屈轶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用以鼓励臣下忠正敢谏，对阿谀、屈从者加以警戒。汉宣帝绘霍光、赵充国、苏武等大臣象

於麒麟阁，东汉明帝将开国二十八将之象绘於云台，用以表彰功臣，鼓励臣子忠君。在古书中关于画像的记载也不乏其例，如《汉书·广川惠王越传》记：“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袴长剑”。《汉书·杨恽传》载：“恽上观西阁上画人，指桀纣画谓乐昌侯王武……画人有尧舜禹汤，不称而举桀纣”。又《汉书·金日磾传》载：“日磾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画於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此画像於宫殿者也”。在《后汉书·赵歧传》中也有记赵歧“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象居宾位，又自画其象居主位，皆为赞颂……”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曾对该殿内的壁画作过如此生动的描述：

“图画天地，品汇群生。杂物奇怪，山海神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谬形。随色相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麟身，女媧蛇躯……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戒世，善以示后……”

到了后来，这种宫殿、楼阁、墙上画壁画的风习逐渐转移到死者墓中去了。《水经注》卷八中记载李刚墓“黄水东南流，南有汉荆州刺史李刚墓……见其碑有阙祠堂石室三间，掾架高丈余，镂石作掾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隐起雕刻为君臣官属、龟龙麟凤之文，飞禽走兽之象。作制工丽，不甚毁伤”。又记载了鲁恭王墓“戴延之《西征记》曰：‘焦氏山北数山，有汉司隶校尉鲁恭……冢前有石祠石庙，四壁皆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象。象边皆刻石记之，文字分明’”。

这种著于墓室内的图象已由绘画变作石刻的目的，显然为了易于保存。这样一来，确实也为后世保存下来大量记载当时

社会各方面的生动形象。

当时人在石室内雕刻各种图象的目的不外两个：一是记载死者生前的事迹，既可显示死者一家的豪华，还可祈求吉祥，希望死者死后能以过上同样的生活。另一目的则是为了教育后世子孙，是死者及造石室人的世界观毫不掩饰的表露。如图象中大量车马、出行、饮宴、庖厨、乐舞、杂技、水陆攻战等，反映出死者生前的一些活动，大量祥瑞图象则是为死者祈求吉祥。多服从于第一个目的。画像中一些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节烈、孝义故事则在于表彰古代的忠臣、孝子、义士、烈女、节妇等恪守封建礼法的人，依第二个目的来说是要人们对画中的人由景仰到效法。所以说东汉时期画像石的出现，一方面为了纪念死者，一方面为了教育生者。其目的都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使人们恪守封建礼法，借以巩固封建统治。这诚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但在客观上却保存下来一些难得的艺术品，它真实、具体、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面貌以及当时的意识形态。画像中的题榜、墓内外的石刻，又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稀有的真迹，石阙、石狮、画像石等更是一批难得的艺术珍品，它们又是一批可信、可靠的历史资料。

汉代的画像石，解放前后各地多有发现。西汉时罕见的一幅画像石是昭帝元凤时的凤凰画像，东汉时的画像石则发现甚多。其中发现最多者应属山东、河南、四川等省，江苏、安徽、陕西、山西、内蒙、湖北、云南、贵州、辽宁、河北及北京等地皆有发现。解放前后，山东的一百多个县、市中，就有五十多个县、市发现过汉画像石。尤其是济宁地区十二个县市中都有，临沂地区九个县，太安地区八个县，昌潍地区七个县以及鲁西南平原的菏泽地区、鲁西北平原的德州、惠民、聊城地区都有。画像石墓目前仍以沂南北寨村、安邱董家庄二处为

最大。如以内容宏富，故事复杂，造型优美、雕刻精细来说，当首推国务院公布的两个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东嘉祥的武氏墓群石刻和长清的郭氏墓群石刻。

二、嘉祥武氏祠

山东嘉祥县城南三十余华里有座武翟山（一作武宅山，旧称紫金山），这里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山的北麓有一坐秀丽的村庄，村名也叫武翟山。在这个村子的北面就是当年著名的武家林，以及它的附属建筑物——全国闻名的武氏祠。

嘉祥武氏，为东汉末年的一个官僚贵族之家。据碑文记载，墓主人之一的武梁曾做过从事（刺史佐吏），梁弟武开明官至吴郡丞（郡守佐吏），开明长子武班官至敦煌长史（佐太守之官，仅次于太守），开明次子武荣更先后做过州的书佐和郡的书吏、主簿、督邮、五官掾及统辖京师步军的执金吾等。由上可知，武氏世代为官，当然势力煊赫，家财宏富，所以在他们死后能以有条件修建起这样富丽堂皇的大型石室。

在武氏坟墓中曾出土一根石柱，上书“武家林”三字，林门前有石狮和石阙各一对。多年来当地群众因见林势庞大，石刻精致，俗呼为“皇林”。石室就是墓前所建专供洒扫祭享之用的石造享堂，石阙则是庙祠以前或墓道上所设立的小型门阙，石狮则是林门之前用以壮观的装饰建筑。

武氏一家，史书并无记载。武氏祠建于何时，何人所建，史书中亦无记载，而在石阙的铭文中却有记载：

“建和元年，太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孟孚、李弟卯造此阙。值钱五十万。孙宗作师（狮）子，值钱十万”。

由此可知，石阙与石狮子应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在武绥宗等人的主持下，由石匠孟孚、李弟卯及孙宗等人具体施工而成。又据武氏几人的碑刻记载：武梁、武班均死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武开明死于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武荣死于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如果在他们死后不断陆续兴建的话，则可推知现存武家林中诸石室大约建造于东汉末年，或者说在公元150—200年之间。

历来对其研究而命名者多有不同。宋人欧阳修的《集古录》中只记“后汉武荣碑”、“后汉武班碑”②，仅对此二碑作过简单的考证，未曾命名。赵明诚《金石录》则记：

“右汉武氏石室画像五卷。武氏有数墓，皆在今济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文词古雅，字画遒劲可喜。故尽录之，以资博览”③。

其后洪适将其文录于《隶释》④，将其图象录于《隶续》⑤，娄机集其字於《汉隶字源》。洪与赵不同处是将“武氏石室”之称改为“武梁祠堂”。清朱彝尊《小蓬菜阁金石文字》亦称“武梁祠堂”。因为清初搜集此石刻最得力的黄易亦这样称呼，故近世以来不少著录因之。道光时瞿中溶作《武梁祠画像考》，称武梁祠，当地群众也曾习惯于这一简单的称呼，其实是不够确切的。因为武梁石室（或祠堂）只是四个石室中的一个，不应以一概全，因此正确的应称“武氏祠”或“武氏石室”。这组珍贵的文物应称“武氏墓群石刻”。

这批画像石诚然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此以前，商、周铜器的花纹，虽饕餮夔龙，雕镂工妙，但不过属于图案之类；战国及汉代铜镜花纹中虽时有东王公、西王母、吴王、西施诸故事，但其大不盈尺。至于东汉后的石刻佛象，虽相当精美，但

已受西域佛教的影响，惟独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具备此前后各种绘画、雕刻艺术所不具备的长处。武氏祠的画像石，大多用减地阳刻法。即在石面上先使欲刻的轮廓之外凹下去，将要刻的地方凸出来，然后再在凸出的地方进行雕琢。这种刻法生动形象，立体感强，比阴刻要复杂得多。欧洲绘画重视阴阳向背，我国古代绘画则重在描线。用界限代替阴影，益显得雄壮质朴，用力小而收效大。如以此画像与《史记》等书对照来看，则曹沫、专诸、豫让、荆轲、秦王等历史人物跃然纸上，不禁使人为我国一千八百多年前有此高超的艺术而赞叹不已。

三、武氏墓群石刻的发现与保管

宋人欧阳修及赵明诚的《集古录》与《金石录》中对武氏祠的碑刻及画像石均有记载，可知这批文物最晚在宋代已经发现（清朱彝尊在一个跋中曾写“右汉从事武梁祠堂画像，传是唐人榻本”。其实是江苏武进唐氏，收藏之人名唐顺之，明嘉靖时人）。但内容很简单，并无人到原地认真了解。再加上年深日久，河流改道，武翟山一带历经洪水漫淤，以致当年相当精致、完整的石室早已零乱、损毁。历年的风沙将室内的石壁、石顶掩埋，因而长期未受人重视。但也因此缘故，却使其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宋时虽为个别金石家注目，但因发现不多，拓本不全，放置零乱，故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这组墓群石刻的被人重视，还仅仅是二、三百年来的事。

钱塘人黄易，爱好书画、篆刻及金石，他在河南做官时，就听说山东嘉祥武氏祠有精美的画像石。后来官授济宁运河同知，更就便致力于此处石刻的搜集与整理了。当时画像石大部埋在地下，虽有少部露于地面，也是屡经风吹雨打，不少损

坏。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八月黄易到嘉祥，详加调查了解后，会同济宁州州官刘永铨派人挖掘和搜集。先后共掘出和访得画象石刻二十余块，除将《武荣碑》及《孔子见老子》画象石运到济宁明伦堂内保管外，为了对这些石刻进行保存起见，在江南学政、大金石家翁方纲等人的倡议下，捐资在当地盖了一口南屋保存。于是重要的石刻二十五块就嵌在所修室内，其余仍埋于地下。接着济宁州人李东琪发现左石室后，又另建东屋三间，将其余画石存入。此两屋皆以石为基，上复瓦顶，将画象石嵌于壁上，并将碑立于室内。到了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蔡纫秋（寿生）等又陆续发现了几块，一并置于室内。其中《武梁碑》、《武开明碑》早已不见，一块画象石在道光年间冯云鹏、冯云鹗撰《金石索》时已不见，四块在民国初年被个别民族败类售给帝国主义，被盗往国外。《武荣碑》及《孔子见老子》画象石仍存于济宁，今嘉祥武氏祠管理所现存汉碑两块，碣一块，汉石阙、石狮子各一对，清碑十一块，画象石四十四块。

解放前，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从来不重视这批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自晚清以至民国，始终无人对它管理，室内任凭飞鸟筑巢，屋漏梁倒，书帖商人更是任意拓帖，毁坏很重。甚至其中的几块在清末民初被人盗运至国外，⑥更是令人气愤。断石柱上的兽形，也在清代被人盗去，当作砚台。但自解放以来，政府在此特设管理所，派来专人管理，先后拨款将到处漏雨的东、南两屋进行修葺，又在院内种植花木，四周修了围墙，更严禁拓帖，妥为保管。1959年又为长期裸露野外、任凭风吹雨淋的石阙修了复盖亭子，进行保护。尤其是1959年中央文化部下达保护文物古迹的通知，1961年6月4日国务院正式公布此处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更受到当地政府及群众的

极大重视。1961年和1964年政府两次拨出数万元钱款大修。在当地划出一个方圆7000多平方公尺（折合十市亩半）的院落，石砌围墙，铁制大门，门内立着1961年6月4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武氏墓群石刻》石质标志。院内西北方新建一口二百平方米，高大、明亮的陈列室，将原地提升的一对石阙和石狮纳入室内，并将所有画像石置於室内四周，妥善、安全地保管、陈列起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影响的外地青年学生远道赶来，要把这批文物当“四旧”、“牛鬼蛇神”砸掉，当地群众坚决不答应。群众说：“从来没有谁给它烧过香，磕过头。它不是牛鬼蛇神”。奋力保护住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

粉碎“四人帮”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历史文物的保护工作。不但加强了武氏祠管理所的工作，当地群众更积极贯彻“四有”方针，群策群力地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今天的武氏祠，枯木逢春，生机盎然，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和游人。

注：①梁思成《中国建筑史》27页

②欧阳修《集古录》卷三

③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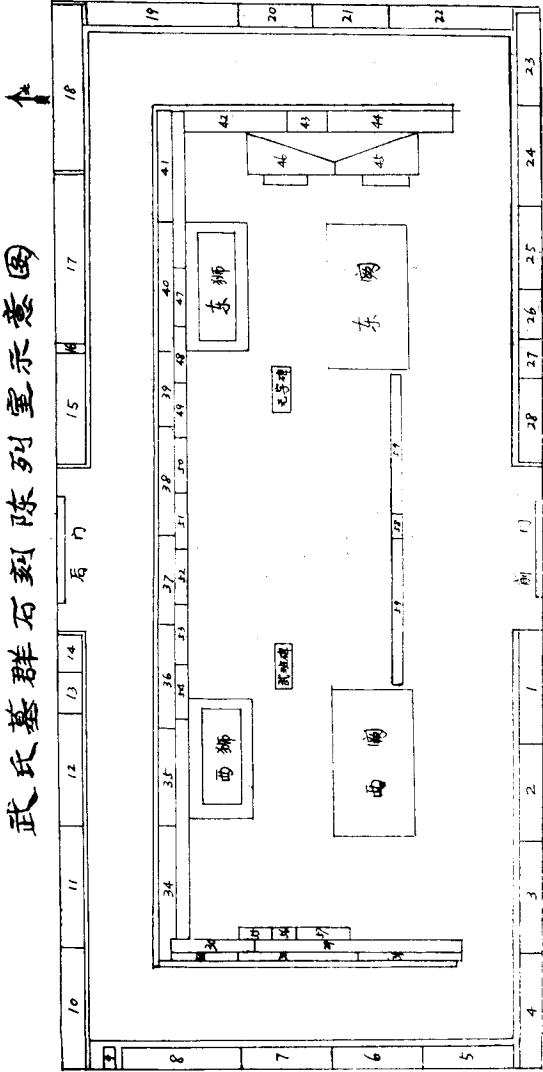
④洪适《隶释》卷十六

⑤洪适《隶续》卷六

⑥《山东通志》卷百五十（艺文金石）80—81页曾记。

这些画像石上刻灵夔噬赵盾、王陵母、子击磬于卫、子路遇丈人等内容。

武氏墓群石刻陈列室示意图



(乐群绘)

说 明

- | | |
|-------------|----------------------|
| 1. 前石室第二石 | 28. 前石室第三石 |
| 2. 前石室第五石 | 29. 前石室第四石 |
| 3. 前石室第六石 | 30. 其他第二石 |
| 4. 前石室第七石 | 31. 其他第十二石 |
| 5. 后石室第一石 | 32. 其他第十一石 |
| 6. 后石室第二石 | 33. 其他第十石 |
| 7. 后石室第三石 | 34. 后石室第六石 |
| 8. 后石室第四石 | 35. 左石室第六石 |
| 9. 后石室第十一石 | 36. 前石室第十石 |
| 10. 后石室第七石 | 37. 前石室第一石 |
| 11. 左石室第二石 | 38. 前石室第十三石 |
| 12. 后石室第九石 | 39. 其他第七石 |
| 13. 左石室第七石 | 40. 其他第六石 |
| 14. 左石室第八石 | 41. 后石室第十石 |
| 15. 左石室第三石 | 42. 其他第一石 |
| 16. 其他第九石 | 43. 其他第五石 |
| 17. 祥瑞图第一石 | 44. 后石室第八石 |
| 18. 祥瑞图第二石 | 45. 前石室第十一石 |
| 19. 武梁石室第三石 | 46. 前石室第十二石 |
| 20. 武梁石室第二石 | 47—54. 翁方纲《重立武氏祠石记碑》 |
| 21. 武梁石室第一石 | 55. 刘孝祐书《石刻数目碑》 |
| 22. 后石室第五石 | 56. 李东琪《武氏名号碑》 |
| 23. 其他第四石 | 57. 陈锦志《重修武氏祠石室记碑》 |
| 24. 其他第三石 | 58. 汉石碣 |
| 25. 左石室第九石 | 59. 汉石条 |
| 26. 左石室第五石 | |
| 27. 左石室第四石 | |

第二章 碑 碣

武氏墓群石刻先后发现的一些碑碣，是这批文物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有东汉时的《武梁碑》、《武荣碑》、《武开明碑》、《武班碑》，还有清乾隆年间济宁运河同知黄易、嘉祥知县刘孝祐（永铨）、江南学政翁方纲和济宁州人李东琪等人立的一些碑碣等。现分述于后：

一、汉 碑（五块）

1. 《武梁碑》：

《武梁碑》发现于武梁石室之前。据记载：碑呈圭形，靠碑顶处有穿。此碑早已佚失，只能在前人的著录中找到记载：

“汉从事武梁碑（元嘉元年）

右汉从事武梁碑云‘故从事武掾。掾讳梁，字绥宗。掾体德忠孝，歧嶷有异。治韩诗，阙愤（愤）传讲。兼通河洛、诸子传记’。又云‘州郡请召，辞疾不就。安衡门之陋，乐朝闻之义’。又云‘年七十四，元嘉元年季夏三日，遭疾陨灵’。其后有铭云‘懿德玄通，幽以明兮。隐居靖处，休曜章兮。乐道勿荣，垂兰芳兮。身歿名存，传无疆兮’。其他刻画皆完（无）可读，文多不尽录。碑在济之任城。余崇宁初，尝得此碑，爱其完好。十余年再得此本，则缺其最后四字矣”。①